

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趨向與危機

張梅駒

政治作戰學校敵情研究學系

在中共政治體系中，意識形態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提供中共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因此，本文試從舒曼（Franz Schurmann）對意識形態的分析方法與歷史研究的分析途徑來剖析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趨向，意識形態在中共統治中成為被用來解釋和辯護社會制度的信仰體系，同時為這個制度的設立與發展提供綱領性的指導。然而，長期實踐過程中付出了重大代價，甚至成為災難，因此導致人民對其信仰體系極度漠視，而對其實踐體系更加以激烈的抗拒和排斥。結果大陸上出現「共產主義渺茫論」與深重的「三信危機」。中共非但不能審時度勢，反而試圖以激化的民族主義來填補意識形態的空白，這意味著中國人要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甚至要遭受戰火的磨難。因為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就是對外戰爭。

關鍵詞：意識形態、異化論、民族主義、市民社會

壹、前言

中共建政以來，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等各方面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徹底的實行了黨和國家干預一切社會和個人生活的極權主義，致使個人崇拜、家長制、一言堂、裙帶關係就成為必然。在個人專斷的極權主義氾濫下，釀成了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軍事鎮壓及其以後的「白色恐怖」的災難，公民的基本人權、政治權利普遍遭到踐踏。由於意識形態的控制，人們往往難於從政治上，從民主制度的欠缺和存在的弊端方面去認識造成災難的原因。只是當「文化大革命」使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走向崩潰之際，人們才覺醒起來。

本文要討論的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意識形態如何反轉過來在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作調整和適應，並且要指出形式的調整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僅不能適用，根本就是矛盾。中共意識形態在毛死後，確實有過修正，而且幅度頗大，但是中共僅止於理論上形式的修正，制度上所存在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的作祟，「修正」過的意識形態仍然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產生著嚴重的矛盾，甚至潛藏著深重的危機。

貳、後文革時期意識形態的危機

在研究中共問題時，通常會涉及到「意識形態」，因為在中共政治體系中，意識形態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提供中共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是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來源。¹由於中共強調階級的立場，因此被認為反映無產階級利益的馬列主義，自然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但隨著中共領導階層的更迭，中共當權者對於馬列主義的詮釋，以及個人的政治理念，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內容，增添新的成份。任何人掌握了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就象徵著對政治權威合法性的壟

¹ 所謂合法性 (legitimacy) 是指政治上有效統治的必要基礎。這是治者與被治者間一種共識的理則或信念。所有統治者之權力必須經由合法性之過程，始能成為權威 (authority)。權威之治，力少而效宏，方是統治之正途。但合法性不即是法律性 (legality)。合法性可以基於一種宗教之信仰系統、可以基於一種傳統之習俗、可以基於某種政治之原理，也可以基於一種理性的法律程序。簡言之，合法性是一種存在於社會中有意識的與無意識之體認信守之「天經地義」。現代政治中強調合法性之重要，首推韋伯以合法性作為分析的架構，他提出了三種合法性的類型，即傳統權威、領袖魅力的權威和理性的權威。(traditional legitimacy, charismatic legitimacy, rational legitimacy) 參考《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政治學》，第三冊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0 年)，頁 107。

斷，意識形態成了中共政治鬥爭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份。

對此，舒曼（Franz Schurmann）在「中共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一書中的分析，他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可分成二個重要組成部份：一是純粹意識形態（pure ideology）；一是實踐意識形態（practical ideology）。²純粹意識形態是不變的，意指提供黨員或社會大眾一個世界觀，讓他們了解人類的歷史、社會是如何運作及發展，其功能在於形構黨員及社會大眾的思維方式；至於實踐意識形態則是可變的，意指一套能夠提供黨員或社會大眾行動的合理依據，去引導他們從事實踐的行動，它著重實際的行動效果。

在中共政治領域中，研究者廣泛討論的意識形態，基本上包括了下列幾個要素：歷史意識、認知能力、評價能力、行動取向與邏輯一致性。組合上述五個要素，其簡要的定義：意識形態是在某種精密的歷史概念指導下，所形成的一套在邏輯上具有一致性的符號系統，它將個人對社會環境，尤其是對未來憧憬的認知與評估，用來作為一個維持或轉變社會的集體行動的綱領。³是故，意識形態在中共統治中成為被用來解釋和辯護社會政治制度的信仰體系，同時為這個制度的設立與發展提供綱領性的指導。⁴反映在政治領域的正是中共領導人始終高舉「四個堅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道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神泉源。

基此，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可分類為三個主要體系，即信仰體系、價值體系與實踐體系。⁵

- 一、信仰體系—指對事實的認知、即「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和唯物的歷史觀。
- 二、價值體系—指對事物的價值判斷，如「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崩潰論」和「共產主義必然到來論」。
- 三、實踐體系—旨在刺激行為的發生與增強行為的次數和強度。如「階級鬥爭論」、「暴力革命論」。

²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0, p.24-38.

³ Willard A.Mullins, On the Oonept of Ide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Science Review, Vol.66(1972), p.510.

⁴ 吳家安，〈毛澤東死後中共意識形態的演變〉，《十一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論文》，頁1。

⁵ 參見吳玉山，〈意識形態與列寧主義的國家論〉，《東亞季刊》，十五卷，三期（民國七十二年三月），頁141—147。

因此，就馬克思的意識形態三大系統而言，對信仰體系及價值體系，毛澤東是不變的，其所變者是馬克思的實踐體系，此顯示馬克思實踐主義受時、空性的限制，因此中共內部篤信馬列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徒，亦無法遵照其實踐系統以成其革命目的。由於實踐指令無法使行為者在預期內達成目標，並在長期實踐過程中付出了重大代價，其實踐體系與所標榜的價值體系嚴重脫節，因此導致人民對價值體系的嚴重懷疑，與對信仰體系的極度漠視，而對其實踐體系更加以激烈的抗拒和排斥。結果大陸上出現「共產主義渺茫論」與深重的「三信危機」⁶。信仰危機標示大陸人民對馬列主義與毛思想以及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問題產生懷疑和動搖，並由此加深擴大為信心危機、信任危機和黨性危機。

「文化大革命」將中國推入十年動亂，並產生災難性的後果，直到毛澤東死亡，鄧小平復出，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推出「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替代了「毛式共產主義」，這種發展與轉型由意識形態的解構開始，並主張對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進行反思，以使黨員及群眾在思想上脫棄教條主義，在心靈上求得解放。心靈與思想的解放，有利於「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

中共為了克服本身意識形態的危機，於「四人幫」事件後，在政治上已經進行了反極左鬥爭，但為了替「改革開放」創造條件，還必須從思想和理論上清算原來的意識形態，以求能克服意識形態危機。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求清算毛式意識形態-「造神運動」。

中共的理論家們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現實出發，對「毛澤東思想」的實踐做深刻的檢查，然後用「青年馬克思」的哲學和社會學觀點來考察毛式意識形態，他們認為大陸共產主義是「異化的共產主義」也可以說是一種「非人的教條主義的意識形態」。

馬克思在他的「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因勞動的異化而有人人的本質的異化。大陸的理論家由「異化論」分析毛式共產主義，指出毛式意識形態除了勞動的異化外，還有思想的異化、政治的異化和經濟的異化。⁷

⁶ 文革十年之後出現的所謂信仰、信心與信任三方面的危機，亦即是對於社會主義與共產黨而發生的合法性危機。何以失去信仰會成爲一種危機呢？失去信仰表示失去了秩序感與權威感。

⁷ 大陸學者「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在他的文章裡對於中國大陸異化的共產主義做這樣的分析：個人迷信，現代迷信，是思想上的異化。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共黨專政，社會主義民主變成社會法西斯專政，人民的服務員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主人，人民的軍隊變成共黨的軍隊，轉過來鎮壓人民，一切爲人民變成一切爲自己，有了權便有了一切，凡是這些，都是政治上的異化。本來是爲了促進社會生產力而大興共產風，實施大躍進，但是努力的結果不但沒有獲得好處，反而在經濟上製造了一個大包袱給自己背，這是經濟上的異化。社會主義基本的目的，本來是爲了滿足人民得需要，然而以犧牲人民的生活水準去追求社會主義現代化，結果人的幹勁越

毛死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領導者認為，毛思想的指導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都造成相當的傷害。為求政權的生存與發展，必須有所因應修正，使其適合於實際的需要。⁸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⁹該決議中，中共正式評價毛之功過，雖然中共不像蘇共之鞭史大林屍一般，但仍認為毛之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且對毛澤東思想重新定位。毛思想被定位成「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真理」這個概念又重回馬列主義，毛思想被定位成「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中共將毛思想賦予歷史性的同時，也把它打入中共意識形態的純粹性部份，將之與馬列主義並列。因此，毛思想正式與現實的政治、思想及經濟運作相隔離。「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後，鄧小平思想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的實踐性部份，「馬列主義」、「毛思想」加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實踐的「鄧小平路線」正式登場。

一九七八年五月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是中國當代意識形態變遷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這場運動肇始於「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當時的中共宣傳部部長暨中共中央黨校校長胡耀邦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推動了這場運動。「思想解放運動」的實質是中國共產黨內保守的毛主義者（即所謂「凡是派」）同主持進行改革政策的務實派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後一派的總代言人是鄧小平。這場運動圍繞著「誰代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展開，相當一批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在這場運動中對毛澤東思想以及「兩個凡是」¹⁰的理論展開了激烈的批判，並且在黨內形成了一個主張改革的知識份子群體。這批知識份子對於毛澤東思想理論體系的批判，一方面營造了非毛主義的意識形態氣氛，從而直接有利於鄧小平為首的中共改革派，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最終戰勝以華國鋒為首的保守派，另一方面為中共的十年改革奠定了意識形態的基礎。然而，中國知識份子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探索，以及對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晚期思想）的深入批判，隨著鄧小平等權力地位的穩固而遭到壓制。

大，就越吃苦頭，勞動的結果不是對人民有利，反而使人民吃虧，這還是經濟上的異化。

⁸ 朱新民，《一九七八—一九九〇年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台北：永然文化出版公司，民國八十年五月）頁 225。

⁹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五月），上冊，頁 294—360。

¹⁰ 華國鋒，「兩個凡是」的「治國綱領」：「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守」。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的著眼點，在於：掌握足夠的黨、政、軍大權，並透過意識形態的主導與解釋權，成為毛澤東在現世的化身。但是「兩個凡是」的論點卻留下理論的致命傷，成為華國鋒黯然退出權力鬥爭舞台的導引線。

這場意識形態鬥爭的影響至為深遠，它開啟了一個所謂的「撥亂反正時期」。各行各業的人們借批判「林彪和四人幫」而清算毛澤東時期的方針和政策。思想學術界的「撥亂反正」更是如火如荼，對毛澤東時期教條主義意識形態禁錮的衝擊遍及學術的各個領域。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為了使他自認為是當前中國大陸的重大政治問題的此一「解放思想」的觀念，成為中共的黨的綱領，他在中共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開會前夕，又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闡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重大意義，然後表明當前階段一定要把「黨的工作重點轉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上來」，都是因應當時的需要添枝加葉的。而以後的歲月，因為政治形勢動亂不安，人人自危，不能大膽發揮首創精神的情況下，在客觀上益發增添由有權力的鄧小平出來做政策指示的需要。相對地，由於形勢上一方面不能產生有思想的理論家來為中國大陸現有的社會主義思考問題，另一方面不能有有膽識的政治家提出一套政策規劃，因此在主觀上鄧小平也就愈發不能不充當理論家與政治家，提出一些看法。這樣隨著歲月推移，在權力鬥爭和現實需要的形勢下，也就一個片段一個片段地積累成了最後以「鄧小平思想」這個術語來概括的這種奇怪的產物。這種產物的性質，個人色彩極重，而且也以即興式的居多，完全是試驗的性質，不顧影響和後果。這種「思想」的性質，以北京大學校長吳樹青形容得最為貼切，他說，「鄧小平思想」的「全部理論只有兩句話，一句是『黑貓和白貓』的關係，一句是『摸著石頭過河』」。¹¹

鄧小平上台後的主要工作就是發展經濟以救亡圖存，鄧小平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¹²替轉變中的意識形態做理論的辯護與說明。

為了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提出了「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策略。要「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無可避免的必須引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管理方式及受到西方世界思想的影響，故鄧小平一面主張「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需要注意學習和借鑑外國經驗」，但「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堅決抵制外來腐朽思想的侵蝕，絕不允許資產階級生活在我國氾濫。」¹³在鄧小平「經濟反左、政治反右」的格局下、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先後發動了「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運動，以防止資本主義思想的「污染」。

¹¹ 舒思，〈各路『左』將誓師討鄧〉，《動向（香港）》，1992年九月號，頁26。

¹² 《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頁372。

¹³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前引書，頁395。

然而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替新時期意識形態所作的辯護工作，仍遭現實社會內在的某點矛盾：

- (一) 在實踐中對馬列主義做了某種程度的「發展」與「補充」，卻又強調馬列主義其普遍真理性；
- (二) 對毛思想做了實質的批判與修正，卻又強調堅持毛思想原則；
- (三) 在主張社會主義優越性之時，由於採行的是資本主義的手段，從而否定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說法；
- (四) 在採行資本主義手段之時，卻又進行批判資本主義手段產生的「精神污染」。¹⁴

由於鄧路線的內涵與馬列毛的意識形態相互矛盾，導致鄧小平路線的實踐日益陷入不可避免的重重政治社會危機中。質言之，鄧路線既無法滿足保守派，更無法滿足廣大民眾的需求，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

長期以來，中共始終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其政治指導思想，不過當這套思想無法滿足人民需要時，中共不得不重新評價這套信仰系統，但重新解釋或評價這套信仰系統，並不意謂中共會放棄這套系統。自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復出後實行改革開放，改走務實路線，部份西方人士即誤認中共已不再堅持馬列毛意識形態而對鄧寄以幻想，「六四」天安門事件，暴露了中共真正的面目，即中共為了實際的需要，不得不變通其路線及作法，但一旦觸及其意識形態核心時，仍舊會堅定的維護其意識形態。「六四」後迄今，中共一再宣稱「改革開放政策不會變」、「黨和國家的政策不會變」，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卻不斷的強化，企圖以不變的意識形態信念因應現代化帶來的社會變動，及抵擋國際變化所帶來的衝擊，此無異是一種不符現實的主觀願望而已。¹⁵「四個基本堅持」，實際上是政治絕對主義、文化專制主義、經濟統治主義和社會蒙昧主義的再現，這是「野蠻的社會主義」，不是「文明的社會主義」。「四個基本堅持」與「社會主義現代化」根本的矛盾，在方法學上，方法的使用與目的追求必須一致，方法與目的的矛盾，永遠完成不了目的。中共在意識形態的調整上忽略了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帶給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難題。

「鄧小平思想」未來要有出路，要確實取得成效，必須加以深刻地反省，尤其是關於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目前中國大陸的社會發展靠著「鄧小平思想」的

¹⁴ 鄭載一，《鄧小平路線之研究（1978-1987）》，1987年6月，頁53-54

¹⁵ 張雅君，〈鄧小平路線下中共意識形態與社會控制〉，《中國大陸研究》，第32卷11期，頁37。

基本路線，在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方面是培養出一點「資本主義」的苗頭來了。以後這個社會要照這套「思想」來發展資本主義會更有前景，因為它有「鄧小平思想」作溫床，也有中國大陸黨幹和人民自行滋生的資本主義精神在培育著。但是反過來說，如果這套「思想」還是依目前的條件推行，當作是一種「提法」提出來，作為中共政經改革名正言順的思想指導南針，將來要實現社會主義前景的這條道路一定是坎坷無比的。

因此，觀察中共的改革開放，不難發現，中共一方面希望能恢復市場機制，引進西方的資金與技術來活絡大陸的經濟，但另一方面卻懼怕伴隨著經濟自由化而來的政治自由化。故中共時時緊抱著「政左經右」的路線，希望將中國大陸建設成經濟有高度生產力，政治有高度效能的威權體制社會。

職是之故，在中國大陸目前繁榮穩定的表象背後，是強硬的政治及社會控制。這種矛盾現象的同時發生，中共認為這是「正、反、合」的辯證表現。但是，中共這種「政左經右」的格局，是無法長久地維持下去，在國際貿易總值已高估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四十的今天，大陸非國營經濟的巨大活力已成為整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而市場經濟的不斷擴大，終將使中國大陸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恢復相對自主性，使中國大陸從極端的國家主義(statism)中掙脫出來，讓「市民社會」和黨與國家機器間形成法制化的相互制約以及相互涵容的關係，並且建立起對「市民社會」負責的法治政治，同時產生反省批判意識形態的能力，使中共經濟改革擺脫中共意識形態的掣肘，邁向「後共產主義」。

參、後鄧時期意識形態的危機

中共「十五大」的召開，標誌著江澤民時代對「後社會主義」¹⁶中國發展的最高戰略部署。「十五大」的報告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其中包括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

江澤民雖然是執掌經濟出身，但這十年來並沒有把主要力量放在經濟改革與建設之上。尤其是近五年來，江澤民基本上主要在抓兩件事。一件事是抓領導班子的調整，包括中央級、地方省市級以及軍隊高層領導班子，另一件事是抓中共的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和宣傳輿論陣地。這兩件事對確立和穩固江在中共的領袖地位起了極為關鍵性的作用。當然，從中共的歷史來看，這個做法並不屬於江的首

¹⁶ 所謂後社會主義，意謂人們不再把社會主義視為一種放諸四海而皆準、亙古而不變的真理來看待，而會從各自的國情或民族條件出發，將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與本土化、民族化的過程結合在一起；亦即不再把社會主義視為超歷史、超國界、超民族、超地域的具有普遍有效的理想目標，而是必須因應現實而不斷被修正調整的理念和建制。

創。這個抓槍桿子、筆桿子的「兩桿子」理論和實踐，從根本上講是從毛澤東那兒來的。但自毛以來，江是運用和實踐這一理論最賣力、最積極、也是最有成效的一個。鄧小平由於他的資歷與背景以及他當時在中共的特殊地位，並不需要這「兩桿子」來維護他的領導地位。但江不同，他幾乎是白手起家進入中央，而又可能在鄧死後面臨一個「權力真空」或「傳人真空」的時期，所以這個「兩桿子」的理論和實踐對江澤民來說就成了一個法寶。

從十四大到十五大的五年間，由江澤民與丁關根控制的中共思想意識形態與宣傳輿論工具，為了從鄧小平時代逐步過渡到江澤民時代，並為確立和穩固江澤民的領袖地位，打了一系列宣傳戰役。這一個接一個宣傳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全黨全軍全國創立江澤民的領袖形象，樹立江澤民的絕對權威，確立江澤民的核心地位，建立江澤民的政治體系。大體來說，從十四大至十五大期間，中共思想意識形態及宣傳輿論共發動了四個主要戰役。

第一個大的宣傳戰役是通過大講特講鄧小平的功績，而實際上是為江澤民這個由鄧挑選的接班人造輿論。近幾年來對鄧小平的大張旗鼓的宣傳看起來是在紀念這位老人，向他致敬，但深層的意義是為了使江澤民能夠平穩地從鄧小平時代過渡到他自己的時代。因而，神話鄧小平的最終目的，其實是為了神話江澤民，型塑這位突然挑選上來的接班人在中共黨內的領袖地位能夠合法化、正統化、自然化。

第二個大的宣傳戰役是江澤民親自發起的在全黨全軍全國廣泛開展的「三講」運動，¹⁷特別是「講政治」運動。通過「講政治」可以十分有效地將全黨全軍全國堅定不移地與江澤民的黨中央保持一致，堅定不移地維護江澤民的權威，堅定不移地聽從江澤民的指揮。

第三個大的宣傳戰役是歷時經年的，在全國上下廣泛展開的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在大陸的十多億群眾中，江澤民既沒有毛澤東那樣的威望，也沒有鄧小平那樣的好評。但江澤民要確立和穩固他的領袖地位又必須要有億萬群眾的認可。這場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則可以達到把老百姓愛國熱情融化為對江澤民的感情支持。

第四個大的宣傳戰役是近幾年在大陸甚囂塵上的民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之所以成為中共近幾年來確立和穩固江澤民領袖地位的又一個法寶。

如果說從十四大起江澤民通過一系列的方式逐步控制了中共的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與宣傳輿論陣地，使他們為確立和穩固他的領袖地位服務的話，那麼可以說至十五大召開前，江澤民已經全面地控制了中共一切思想意識形態與宣傳輿論

¹⁷ 「三講」--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十五大」以後，江澤民進一步大搞「三講」運動，實行「人人過關」，成了一場新式的整風運動。大公報（香港），2000年2月21日，A版4。

機器，並且能夠得心應手地用他們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服務了。由於十五大的召開正是標誌了鄧小平時代的結束與江澤民時代的開始，因而，以十五大為契機，江澤民對思想意識形態與宣傳輿論的控制和利用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特別是對江澤民個人的宣傳上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是江澤民趁鄧小平去世、十五大召開這個歷史時機，為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和地位、全面開創他自己的時代所精心安排的又一個戰略部署。實際上是進一步全面宣傳江澤民，造輿論、樹權威，大造特造江澤民的個人威望。十五大後，其主要走向如下：

- (一) 第一個新走向是對江澤民的宣傳更加明確地個人化、單獨化。無論是數量、質量、規模、口徑，中共思想意識形態與宣傳輿論對江澤民的宣傳都達到了一個頂峰。
- (二) 第二個新走向是對江澤民的宣傳趨向理論化、系統化。中共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宣傳輿論機器這些年來下了不少功夫，其中突出的有兩件事。一是「與總書記談心」一書的出版。這本書通過所謂的介紹總書記的「理論觀點」，把江澤民塑造成了一個理論家、思想家。此書在中共高級幹部人手一冊，以此大樹特樹江澤民的理論形象。二是由人民日報與新華社共同組織編寫的一個重量級系列報導。十多篇由資深記者和編輯撰寫的分析性報導，從各個方面論述了從十四大至十五大期間全黨全軍全國在江澤民領導下取得的變化和成績，重點從理論的高度和深度闡述了江澤民的個人作用。這樣著眼於個人作用的系列報導，是以往一些年裡所沒有的。這一本書和一個系列報導以及其他的「理論包裝」，是意圖使江澤民的形象產生一個質的跳躍，即從一個只是被鐵腕人物挑選中的技術官僚接班人變為一個具備深刻的思想、堅實的理論等領袖素質的黨和國家的領袖。這種對江宣傳的理論化、系統化對江澤民進一步鞏固他的權力、全面進入他的時代是十分有用的。
- (三) 第三個新走向是對江澤民的宣傳走向國際化、世界化。在江澤民控制下的中共宣傳輿論機器，在他們的對內對外報導中，把江澤民塑造成了一個成功的國際政治家、世界性領袖，使江的形象進一步得到了升格和完美。

建立一個政權、鞏固一個權力靠槍桿子和筆桿子，推翻一個政權、削弱一個權力也靠槍桿子和筆桿子。江澤民雖已黃袍加身，但仍然不會允許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與宣傳輿論陣地被黨內其他領導人所掌握。毛澤東發動過的每一次政治運動，包括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憑藉他對思想意識形態與宣傳輿論機器的絕對控制從而操縱大局，決定其他領導人命運的。鄧小平在 1978 年的第三次崛起，

並由此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時，也是靠掌握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與宣傳輿論陣地之後，發動了對真理問題的討論運動而置華國鋒的「凡是」派於失敗的位置。這些歷史上的例子提醒江澤民即使在穩坐黨、政、軍元首的交椅時，也必須牢牢控制住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與宣傳輿論陣地。而事實上，江澤民也的確是這樣在做的。十五大以後，江澤民通過了丁關根對思想意識形態領域及宣傳陣地緊緊實行著嚴格的「宏觀控制」。一方面，江澤民不斷繼續強調要「講政治」，要以「講政治」駕馭全局，要繼續「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加強思想意識教育」，強調「輿論工作是黨和國家的前途與命運所繫的工作」是「黨的生命的一部分」，要強化「中央對各級輿論工具的控制權威」，堅決反對引進西方的「新聞自由」模式，堅決取締一切「反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要「確保宣傳輿論的領導權始終牢牢掌握在忠於馬克思主義、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手裡」。另一方面，又使中共思想意識形態及宣傳輿論進一步一面倒，對江澤民個人的宣傳更為變本加厲，新聞報導一概以江澤民的活動為核心，報導的口徑一概以江澤民的講話調子為尺寸，對思想意識形態及宣傳輿論隊伍的調整、整頓一概以對「江澤民為首的黨中央」的忠誠度為標準。中共的思想意識形態與宣傳輿論一方面正發生許多形式上、手法上的巨大變化，而另一方面也越來越從一個「黨的工具」變為一個由江澤民及其心腹所壟斷控制的「個人工具」。但不管是江澤民的一整套控制手法也好，還是中共思想意識形態及宣傳輿論體系的基礎也好，都是依附在共產黨整個政治體系之上的。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在中共建黨八十週年正式提出：「總結八十年的奮鬥歷程和基本經驗，發展新世紀的艱鉅任務和光明前途，我們黨要繼續站在時代前列，帶領人民勝利前進，歸結起來，就是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盡人皆知，江澤民深切盼望他的「三個代表」講話能成為中共未來的指導思想，於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黨章總綱中，將之增列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江澤民講話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中共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畢業典禮上強調，江澤民關於「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世紀之交、千年更替的重要歷史時刻，基於對國內外形勢，從事有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作出的「戰略性思考」，為面向新世紀進一步鞏固自己、加強自己、提高自己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胡錦濤指出，實踐證明，一個馬克思政黨，如果偏離了「三個代表」的方向，就會發生失誤和挫折。如果背棄了「三個代表」的要求，

「就會變質，最終走向自己的反面」。¹⁸

中共「新華社」又以「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新發展」為題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指出，「什麼時候堅持了『三個代表』，當好了『三個代表』，黨就前進，就發展，就朝氣蓬勃，就走在時代潮流的前列；什麼時候如果偏離了『三個代表』，沒有完全當好『三個代表』，就會走彎路。就會遇到困難，遭受挫折。」因此誇稱「三個代表」理論，是在新形勢下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新綱領。它「豐富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寶庫。」¹⁹

綜上所述，顯見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基本內涵，是要以此為標準，加強中共的黨建工作。難怪「人民日報」刊出的文章說，「三個代表」是對中共將近八十年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黨的科學總結，是新世紀的黨建綱領。

北京政界人士認為，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標誌著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第一次推出了自己的「理論學說」。「江澤民理論」將像「鄧小平理論」一樣得以正式建立。顯示江澤民不僅在中共黨建理論上有所建樹，而且在「江澤民時代」也因為有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而顯得更完整。這便是江澤民之所以要提出「三個代表」的政治意念。

在新的世紀裏，由江澤民所主導的一系列黨、政改革無非是為因應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全面普及化而替中共政權的存續發展尋找出路，方法就是將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色彩的中國共產黨向「全民黨」轉化。此外，江澤民也藉著「三個代表」思想的揭示奠立「江理論」，以尋求歷史留名，確立接班路線。²⁰然而江澤民「三個代表」的建黨理論和接納資本家入黨的主張，實際上改變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根本性質，從而也改變了「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和繼續革命」的根本立場，最終地取消了「以階級鬥爭為綱，消滅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消滅資產階級剝削的根本任務」，代之以資產階級的「唯生產力論」、「科技興國論」、「全民共同利益論」。²¹最重要的意義是，它顛覆了中國共產黨「工農階級專政、消滅資產階級」立黨、執政的意識形態。

由於「三個代表」思想與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嚴重分歧，是一項巨大的路線轉變，因此各方正反意見不一。擁護者如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也是江澤民親信的黃菊宣稱，「七一講話」是重大理論創新，是馬克思理論的第三次飛躍（第二次為列寧學說），其威力比改革開放二十年還要大，是與時俱進的馬克

¹⁸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0年6月1日，版1。

¹⁹ 人民日報（北京），2000年6月1日，版2。

²⁰ 葉非比，〈中共試圖『政改』跡象再現〉，<http://www.mac.gov.tw/mlplocy/mwreport/8912/1-2.htm>，2001年。

²¹ 金堯如，〈中共再一次救亡〉，《開放（香港）》，第177期，2001年9月，頁34。

思綱領性文件，是廿一世紀的《共產黨宣言》。這明白告訴人們：江澤民學說，遠遠超過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²²2001年8月，為期兩週的北戴河會議，除廣泛討論新世紀形勢下的建設、治安、科技和國際關係等方面的問題²³之外，並討論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將江澤民「七一講話」與「三個代表」思想納入大陸高等院校的教材。²⁴

不過，反對的聲浪亦沸沸揚揚，主要來自共產黨內的左派人士。自「三個代表」提出後，引發體制內外意識形態的爭論，「左」、「右」兩派衝突態勢似乎升高，尤其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宣示私營企業主可以入黨，更因此遭受許多挑戰。左派攻擊江澤民的班底是以江為首的「黨內新生資產階級當權派」，並頻頻於北京召開百人以上之研討會，發佈「影子政策」、「萬言書」等四篇批江萬言書，質疑：在確立江澤民思想體系後，第四代領導人將高舉「三面紅旗」，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江澤民「三個代表」，²⁵江澤民「三個代表」其實是修正主義路線，背叛毛澤東有關階級鬥爭、黨與國之教義，妄圖將中國共產黨變為「社會民主黨」；且其對外政策過度重視和平發展，無視廿一世紀仍為「動員無產階級反新帝國主義的鬥爭」，²⁶目前的問題主要出在政策導向，即一步步把中國人民引向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²⁷循此改革路線，終將導致私有化，社會主義統治基礎將崩解。²⁸其中左派的代表人物鄧力群直斥江的「七一講話」是「極其重大的政治錯誤」，而且違反黨的組織紀律，分裂黨。²⁹

左派的動作還不止於此。就在2001年北戴河會議舉辦的同時，左派也在秦皇島集會，由有左派大本營之稱的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張啟華主持，出席者包括鄧力群以及吳權域、吳冷西、魏巍等人，討論如何進一步阻止中共修改黨章，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而會議選在秦皇島舉行，明顯有向北戴河施壓的意味。³⁰他們不但反對資本家入黨，還批評江澤民搞個人崇拜，企圖將「三個代表」理論塞

²² 吳三丹，〈北戴河的權力信息〉，《開放（香港）》，第177期，2001年9月，頁17。

²³ 夏文思，〈中共十六大人事突變〉，《開放（香港）》，第177期，2001年9月，頁10。

²⁴ 中央日報（台北），2001年8月4日，版7。

²⁵ 中央日報（台北），2001年8月8日，版7。

²⁶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8.30；葉非比，〈中共高層企圖重啓政改〉，<http://www.mac.gov.tw/mlplocy/mwreport/8909/1-2.htm>，2001年。

²⁷ 〈萬言書挑戰江理論體系〉，《亞洲週刊》，2000年8月14日~20日，頁30-32。

²⁸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8.30；葉非比，〈中共高層企圖重啓政改〉，<http://www.mac.gov.tw/mlplocy/mwreport/8909/1-2.htm>，2001年。

²⁹ 夏文思，〈中共十六大人事突變〉，《開放（香港）》，第177期，2001年9月，頁10。

³⁰ 中央日報（台北），2001年8月8日，版7。

入黨綱。³¹他們舉出江澤民的三條罪狀：³²

- 1、徹底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
- 2、徹底背叛了「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革命立場。
- 3、向資產階級出賣了共產黨的靈魂，出賣了全國人民的利益。

因應來自左派的嚴峻挑戰，江澤民審慎扮演調和者及折衷者的角色，尋求黨內「左」、「右」兩派之平衡，擔心「反右」太過予左派發揮空間，不利經改進程，挑戰其「十六大」領導權。除持續收緊自由派言論空間，整肅報刊外，對極左份子利用「反右鬥爭」重新挑起經改論戰甚為不悅。他認為威脅穩定與發展，一定程度等於反對江權威，故已要求將反改革的極左勢力「消滅於萌芽階段」，並責成智囊撰文批判相關文章大力批左外亦不忘打右，抨擊主張政治自由化及經濟私有化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分子。³³另一方面，2001年初以來江澤民對自由派知識份子李慎之、劉軍寧、樊綱、茅于軾、何清漣等人所採取之壓制行動，即係受到黨內左派的強大壓力。江了解在共產主義旗幟下的改革，無論其權位之鞏固或未來接班部署，皆須黨內左派之支持。³⁴

中國共產黨1999年修憲時，宣布私人企業是經濟的「重要元素」，不只是國營企業的「補充角色」。而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進一步強化了私人企業的份量，而且他還企圖撰寫新的共產黨黨綱，修改黨綱中「無產階級先鋒」的精神，以便接納那些在中國大陸創造就業與繁榮的資產階級人士，這意味要中國共產黨與共黨強硬派痛恨的資本家和解。³⁵這項改革是否會成功？江澤民要如何平息黨內「左」、「右」兩派的尖銳衝突，而他又會將中國共產黨的體質轉型到何種地步，把中國共產黨的未來帶到哪個方向，實值得深入觀察。

後社會主義中國在發展上最大的矛盾是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築的不調和。中共的政治弊端，長期以來是表現在權力過份集中、官僚主義、家長制、特權現象和封建主義殘餘等，這不但是政治體制問題，也是政治權力結構問題。因此，即使不方便立即實行民主政治，也絕不能只滿足於目前的行政改革，而是要深入政治體制改革並面對民主化。所謂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指轉變政府職能，更涉及中共中央黨政權力運作乃至民主選舉機制的建立。因此，在此發展與轉型階段，有關政治改革問題，中共宜把重點置於：1、如何從「強人領導」轉向「集

³¹ 許行，〈資本家入黨：是異化還是同化〉，《開放（香港）》，第177期，2001年9月，頁29。

³² 金堯如，〈中共再一次救亡〉，《開放（香港）》，第177期，2001年9月，頁34。

³³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00.8.30；葉非比，〈中共高層企圖重啓政改〉，<http://www.mac.gov.tw/mlplocy/mwreport/8909/1-2.htm>，2001年。

³⁴ 信報（香港），2000年7月31日。

³⁵ 聯合報（台北），2001年9月4日，版13。

體領導」；2、如何從「革命建國」轉向「專業治國」；3、如何轉變「強國意識」為「大國意識」；4、如何由「行政改革」轉向「政治改革」；5、如何將「經濟偏右」與「政治偏左」的矛盾轉變成「經濟自由」與「政治民主」的辯證統一。這恐怕是江澤民在引導後社會主義中國進入廿一世紀，所要面對的最大課題。³⁶

依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經濟基礎發展與政治上層建築的矛盾，才是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轉型的真正障礙所在。此一矛盾之解決，有賴中共加速政治改革，以使「生產關係」適應於新型的「生產力」。如果中共看不到這一點，仍然以一黨專政取代政治民主，則此矛盾會逐日的增加，最後不是束縛經濟生產力，就是經濟的生產力會衝破舊有的生產關係，不論是何者，都將是中共政權合法性危機的再次來臨。³⁷

改革開放廿餘年來，中共一路走得崎嶇，內部環境與國際情勢都有明顯的變化。對中共考驗最深的仍然是經濟發展問題，暴露缺陷最多的也在於經濟領域。在入世之前，中共單軌運作，比較層面在於經濟成長數據，有競爭的事實，沒有競爭壓力。然而與「全球化」接軌後，市場敞開，所有的失範脫序、雜亂無章立見真章，而法制不嚴、機制不全、信譽不裕、道德淪喪更讓人吃驚，中共的綜合國力、綜合競爭力，不再是亮麗的假設，而是無情的貶抑。處此情景，中共確實到了應該痛定思痛的地步。入世之前，中共的局部改革，可以緩解淺層次的亂象與弊端，用治標的糾偏措施，收效於一時一隅；入世之後，中共必須徹底的作肢體整建、功能調整、機制建構等大手術、大工程，接軌後的比較，優勝劣敗是出局與否的審判，沒有花樣、沒有技巧，純然是硬碰，深層次的矛盾、困難與前瞻性的政策思考、戰略佈局，都不是抱殘守缺以遵行「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江澤民講話」就能迎刃而解。這也是江澤民面臨權力移轉前的心頭大事，沒有好的立論指導，爛攤子難收拾，主政十四年的政績是負頁，永遠揹負著歷史的譴責、群眾的咒罵、對立者的嘲笑。之所以急於「統一思想」也是緣之於此，其難處也盡在於體制沉痾，積重難返。

肆、中共意識形態的發展趨向

在二十一世紀必然邁向後社會主義和後資本主義的方向，這種發展方向使得中共將很難再做傳統式的社會主義的堅持。在經濟全球化以及資訊時代來臨之

³⁶ 〈中共十五大應為政治體制改革鋪路〉，聯合報社論（台北），1997年9月12日，版2。

³⁷ 姜新立，〈後社會主義中國發展轉型論〉，《東亞季刊》，第30卷第2期，1999年春季，頁36。

際，中國大陸將如同其他國家或地區一樣面對傳統的世界觀、歷史觀和價值觀快速變遷的嚴肅課題，中共很難再依賴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及鄧小平理論作為其意識形態的核心部份。而面對中國大陸這種可能的變化，我們也不要簡略地說成是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因為未來中國大陸所可能發展出來的路，不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邏輯所能解釋清楚的，「民族主義」有可能在中國大陸未來發展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³⁸

「後鄧時期」，面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巨大的變革，民族主義在中共意識形態領域上成為解決它的發展危機的一帖萬靈藥。總的來說，民族主義是毛澤東思想的一種面貌，是鄧小平理論體系的一個輔助說明物，在「後鄧時期」卻是「江澤民領導核心」的一個精神支柱。

關於意識形態機制更新的模式，學者金觀濤與劉清峰在研究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時提出相關的論述。他們結合歷史結構主義與文化研究途徑，強調傳統中國社會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意識形態的社會組織。當傳統的一體化結構無法對抗西方國家衝擊時，出現傳統意識形態的認同危機，以及相對應一體化組織的解體，由於中國社會與社會組織一體化的聯繫並沒有改變，因此，危機的後果只造成意識形態更新，及運用更換意識形態的方式以產生更具社會動員力的一體化組織來適應西方文明的衝擊。³⁹ 新的一體化結構下，馬列社會主義重新與儒家思想結合成為新的統治意識形態，並對於一國政經組織進行重組，為了維持統治，不允許多元思潮對於正統意識形態的衝擊。新興一體化結構在不能應付西方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挑戰時，只能再度更新意識形態機制，達到追求現代化的目標。這種更新意識形態所建立的新一體化結構，是一種為保持社會穩定的而調整的暫時機制，並與西方資本主義不斷的衝突，唯有更新的一體化結構再次解構，才能適應國家經濟成長的需求。⁴⁰

共產國家的政經轉變，反映在官方意識形態的破產以及本國政治文化復興。官方意識形態的破產係指共黨統治精英與人民對於官方意識形態的不信任，使得共黨合法性基礎逐漸削弱甚至瓦解。

共產意識形態的殞落必然伴隨本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藉以填補意識形態的空缺。如果共黨政權係為該國民族主義的象徵，民族主義將有可能填補意識形態的局部真空，而使得民主轉型不易發生，共黨政權得以鞏固；反之，如果該國共黨政權並非民族主義下的產物，反而被定位為原共黨集團的附庸，民族主義的興起

³⁸ 張亞中、李英明，《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2001年2月，頁15。

³⁹ 金觀濤、劉清峰，《開放中的變遷》（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4年4月），頁15。

⁴⁰ 金觀濤、劉清峰、前引書、頁518—519。

將進一步打擊共黨政權合法性的地位，並加速政權進一步的瓦解。⁴¹

二十世紀末，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破產，眾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政權垮台。在共產黨政權垮台的國家和共產黨仍然執政的國家都留下了一個意識形態的空白（ideological void）。一切過去被禁止的思想意識都試圖捲土重來，填補這個空白。其中突出的，要屬民族主義。

共產主義的瓦解，釋放出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一但人民的經濟地位和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思想變了，社會主義便不能抵禦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進攻。極端民族主義有如一場龍捲風，掃蕩了其途徑上的一切，只剩下廢墟」。⁴²

最近幾年來，在中共傳統的馬列主義、毛思想意識形態式微之後，中共正越來越借重民族主義，以圖借此重建其第三代領導人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作為中共一種新的替代性意識形態，已經受到中共當局越來越多的依賴。中共試圖以強化民族主義來渡過其面臨的政權危機。

在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大後，中共的意識形態開始向下列結構過渡：純粹意識形態為馬列主義、毛鄧思想，而實踐意識形態則為民族主義。「後鄧時代」在鄧小平從中國政壇引退後已經開始。在這一尚未定型的意識形態結構中，鄧的思想與毛和馬列，都完全不同。鄧在理論上並沒有什麼創見，他的著作中大多是具體的政策陳述。目前中共的意識形態處在雜亂無章的狀態。一方面，中共試圖將改革開放時代的各種新的政策和方針吸收到其意識形態的核心之中，即所謂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中共又不能貿然拋棄馬列主義、毛思想，即所謂的「堅持馬克思主義」。顯然，將各種不同乃至相互矛盾的思想，一起裝進一個意識形態的「筐子」裡，必然會出現衝突，導致其功能的紊亂和失效。「三信危機」的出現，反映了中共意識形態作用衰落的現狀。所以，中共目前越來越依賴實踐意識形態來維繫其統治。

進入鄧小平時代後，中共雖然宣稱改革是在馬列主義、毛思想指導下進行的，但鄧小平的改革思想已經遠遠離開了馬列主義。鄧在毛開創的「中國自己的路」上繼續前行，進一步推進馬列意識形態的本土化。在鄧小平思想中，已經很難找到馬列主義的根據了。他提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鼓勵發家致富，允許私有制的發展，主張富國強兵，取消「階級鬥爭」政治路線和計劃經濟這兩個社會主義最根本的特徵。在西方國家的矛盾中，中共主要強調的不再是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更多地宣揚國家利益的衝突。在今天的中國，從西方傳進來的馬列

⁴¹ 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之比較》（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4月），頁17-25。

⁴² Alexander Yakovlev, *The Fate of Marxism in Russi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3), p.72

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制度，如階級鬥爭、計劃經濟、按勞分配、公有制度，已經消失或正在衰退之中。而真正有生命力的，還是中國本土的東西。這可以說是中共意識形態進一步中國化的結果。而本土化，就是民族化。這正是當前大陸民族主義興起的最重要的潛在的前提。

在蘇聯崩潰、冷戰結束後，中共政權順乎邏輯地成為西方自由世界的頭號對手。畢竟在中國大陸共產黨還在維持著一個專制獨裁的統治制度，中共的經濟與軍事力量在急劇增長。從前，美國為了對付蘇聯而與中共聯手。現在，美國必須面對中國這個對手了。因此，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摩擦比以前增加了很多。這固然是因為中國大陸走入國際社會引起的新問題，但也與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有關。中國大陸有不少知識份子甚至認為，目前大陸民族主義的高漲，是美國送給中共的一個禮品。大陸反美情緒如此強烈，在文革結束以來還是首次。⁴³

中共當局積極掀起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美的浪潮，其意圖是很明顯的：國內的社會矛盾日益嚴重，人民對中共政權之不滿日甚，中共企圖把民眾的注意力從內憂轉到「外患」上去，借此減輕壓力，此其一。中共借灌輸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論和陰謀論，煽動民族仇恨，打擊國內民主力量，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其專制統治，此其二。中共利用大陸民間的反美情緒作為「民意牌」，向美國施壓，並展示中共強硬派的幕後力量，此其三。其他種種打算，不必枚舉。總之，中共煽起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最終的目的是為了鞏固並加強其一黨專政的統治。⁴⁴如前所述，民族主義是當今殘存的共產黨執政國家用以動員民眾的唯一一張王牌了。

此外，西方有關文化主權和經濟主權的理論，也被利用來為民族主義強身。中共的學人根據西方的一些理論認為，文化的交流，特別是西方文化大量地進入中國，形成一種「文化霸權」，⁴⁵對中國的主權產生了限制作用，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的發展，大量外資和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對於中國的主權也產生了干涉的作用。

「六四」天安門慘案發生，軍事鎮壓使中共政權喪失了合法性，沒有政治改革同步的經濟發展使各種矛盾與弊病日積月累，因而廣大人民與中共政權離心離德。加以西方國家不斷譴責中共在人權方面表現不佳，這一切使中共政權感到危機四伏而惶惶不安。於是大唱反和平演變的老調，重提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論與陰謀論，以轉移人民的視線，這就為極端民族主義的抬頭創造了條件。

⁴³ 齊墨，〈民族主義—中共的替代性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1997年8月，頁180。

⁴⁴ 蘇紹智，《區分兩種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1997年8月，頁191。

⁴⁵ 同註43，頁180。

體育也成為中共挑動民族主義情感的有效手段。「六四」之後，中共最先企圖以亞運會在北京的舉行(一九九〇年十月)來增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所以，中共特別宣揚「亞運意識」。亞運會的舉行，對於中共緩解「六四」後的社會矛盾，穩定政權，起了重要作用。此後，中共又盡全民之力，爭取在北京舉辦二〇〇四年的奧運會。伴隨著奧運會的申辦，是中國人要走上世界的強烈民族情緒的高漲。⁴⁶

近代以來，民族主義在中國一直有深厚的非理性的根基。近代中國人，一方面羨慕西方的社會的經濟生活與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又因為西方人的入侵而痛恨西方列強。這種複雜的情感，可以用一個法文詞“Ressentiment”(羨慕與憎恨交織、忌恨)來概括。從如今大陸中國人對美國的態度，也可以辨認出這種情緒。一方面，強烈反美的《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在中國掀起熱賣浪潮；另一方面，一本對美國持讚賞態度的書《留學美國》，也在暢銷。到美國留學、參觀的中國人，仍然絡繹不絕。據社會學家 Liah Greenfeld 的研究，這種“羨憎交織”的情緒，是很多後發展國家的民族主義發展的基礎。⁴⁷余英時認為：「中國人一向以『天朝』自居，但百餘年來卻受盡各『先進國家』的欺壓。中國一向師法『先進國家』不遺餘力，但又陷入可望而不可即的挫折感之中。如果說很多中國人都有痛打外國人一頓，出一口惡氣的潛意識，大概不算很誇張」。⁴⁸這種潛意識，在中國大陸日益富強的時候，在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正越來越讓位給利益之爭的時刻，勃然迸發，蔚然成風，良有以也。

英國學者 Michael Yahuda 分析：中國的民族主義有一種「西方的受害者情結」(the West's victim)。當然，這種情結是來自中國過去一兩個世紀以來與西方強權接觸時所留下的痛苦記憶。但是，他說是中國的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往往並不傾向於探討過去為何沒有成功回應西方的挑戰，而傾向耽溺於一種受傷害的民族情感。這使得中國總是有一種想要尋回那失落的榮譽與尊嚴的情緒。⁴⁹中共政權在「六四」之後，特別是在進入「後鄧小平時代」以來，面臨嚴重的法統 (legitimacy) 危機。毛澤東不僅以中國正統的馬列主義者自居，更以「打天下、坐天下」來為其統治的合法性辯護。鄧小平除了在意識形態上奪取了正統地位外，也以「改革的總設計師」作為統治中國合法性根據。現在，這一時代已經過去了。江澤民無法再以事功來論證其法統，他們必須更加依賴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論證。

⁴⁶ 同前註，頁 181。

⁴⁷ 同前註，頁 182。

⁴⁸ 余英時，〈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中國時報，1996年5月10日。

⁴⁹ Yahuda, Michael, "China's Search for a Global Role", Current History, Sep 1999, pp.268.

中共的意識形態向來是其統治法統論證的重要支柱。如果江澤民不能以新的意識形態來論證中共所謂「第三代領導人」掌權的法統，他就必然不能擋住來自黨內和體制外的競爭，不能穩住江山。民族主義在此時之興起，正是中共新一代重建意識形態和法統的一種嘗試。⁵⁰

到現在為止，中共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政治上反對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表現在人權、民主、知識產權的爭論等方面），反對台獨和藏獨；經濟上要發達起來，成為世界強國；文化上發揚傳統，抗衡西化。⁵¹

民族主義是否能夠成為中共新的意識形態主體，以及這種意識形態能否克服目前中共第三代領導人面臨的政權危機，眼下還難以斷言。但中共顯然對此寄予厚望，中共的「人權專家」喻權域在為《中國可以說不》一書寫的後記中說：「我們全黨全國人民都要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頂住西方的壓力、破壞與『和平演變』。只要我們挺過十五年，世界局勢會出現有利於我國的大變化，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必然出現新的高漲」。如果中共成功地利用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出現這種前景並非是不可能的。但這意味著中國人要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甚至要遭受戰火的磨難。因為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就是對外戰爭。⁵²

一種意識形態的形成，需有必要的前提和條件。按照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的看法，一個社會在出現社會、政治和文化危機的時候，也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⁵³ 中共目前面臨「後鄧時代」的各種危機，正在找尋新的意識形態。但意識形態除了是一種系統的思想體系之外，往往還要有一個強人作為代表。在歷史上，列寧、希特勒、毛澤東等人，均是一種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所以，林毓生認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形成與傳播，要依靠「奇理斯瑪」（chrismatic）型人物的出現與領導。⁵⁴ 現在，中共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體系還沒有建成，「奇理斯瑪」型的代表人物也沒有浮出臺面。但人們可以確定的是：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中共的一種替代性意識形態。

中共煽動並利用狹隘和情緒化的民族主義，試圖抵抗當今世界自由民主的浪潮。從長遠來看，根本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也不能輕視民族主義思潮可能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所造成的影響。但我們必須指出：儘管民族主義是中國近代史留下的一種近乎自然的心態，它包含了幾代中國人共同的強國夢，但當它被中共

⁵⁰ 齊墨，〈民族主義－中共的替代性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1997年8月，頁183。

⁵¹ 同前註，頁183。

⁵² 同前註，頁183。

⁵³ 轉引齊墨，〈民族主義－中共的替代性意識形態〉一文，同註50，頁183。

⁵⁴ 林毓生，〈對五四時期思想啓蒙運動的再認識〉，《九十年代》，1989年10月號。

利用，其產生的實際後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在客觀上維護中共的專制統治，妨礙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余英時說過一段話：「民族主義絕不應成為今天中國人的最高價值。中國人幾百年來所共同追求的是一個文明的、法制的、合理的、公平的社會秩序，在這個新秩序中，每一個個人的人權、自由、尊嚴、安全等都受到法律的保障，這只有民主制度才能提供。無論是大陸或台灣，今天都已不存在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民族主義的激情是有害無益的」。⁵⁵

證諸戰後的日本、南韓和台灣的確走了一條西化的道路，這三個地區不僅是戰後亞洲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而且都已實現了政治民主。西化的過程並沒有使日本人，南韓人和台灣人都變成美國人。相反，這三個地區卻是保持自己傳統文化最好的地區。而傳統文化被破壞得最嚴重並且出現精神和文化危機的，恰好是閉關鎖國三十年的中國大陸。⁵⁶

這就不得不使人懷疑，共產黨以愛國主義口號鼓吹民族主義的目的何在。其實，它只是一種政治工具，以造成民眾對外的敵對情緒，並使自己能夠隨時對內打擊異己，以便維護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民族主義是一把雙面刃。」民族主義本身並不是非理性的，但是可以被非理性地運用。民族主義如果作為一個民族爭取或重獲其自豪和自尊的運動的一部份，具有建設性，應予肯定和發揚。但是好戰的、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的民族霸權主義則是對和平與文明的一種威脅，是非理性的。也不合人道主義，應予批判。

⁵⁷

自九〇年代以來，隨著經濟活動與科技在全世界的快速發展，在國際社會中掀起了一股所謂「全球化」的浪潮，這股浪潮一方面衝擊了中國大陸與世界既有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快速改變了中國大陸對世界及其與自身關係的認知圖像。這種衝擊與認知產生了交互影響的作用，衝擊影響了原有的認知，而認知的重新調整又產生了對衝擊的調整，進一步回頭改變中國大陸與世界的關係。⁵⁸

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往往刺激民族國家一種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回應，這是一種階段性合乎邏輯的反應，因此，如何保持自己民族國家本色而不被全球化吞噬是當前民族主義的一種普遍心態。⁵⁹但承認人類的共同價值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不同民族和主權國家的存在，但是為了整個地球的生存與發展，所有

⁵⁵ 同註 48。

⁵⁶ 白夢，〈民族主義與當代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1997年8月，頁146。

⁵⁷ 蘇紹智，〈區別兩種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與中國前途》，2000年，頁186。

⁵⁸ 徐斯儉，〈全球化：中國大陸學者的觀點〉，《中國大陸研究》，第四十三卷第四期，頁2。

⁵⁹ 張西山，〈經濟全球話與民族主義〉，俞可平、黃衛平編，《全球化的悖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246。

的地球人都必須接受和創造某種共同的價值觀、正義觀。在這個問題上人類應該要進一步克服思想上的僵化。⁶⁰在這樣的觀點下，民族主義，尤其是激化的、偏狹的民族主義便顯得落後、危險，甚至不文明。

「今後，一個民族最大的光榮是在全球價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額。全球化的未來將是全球價值形成並發揮主導作用的局面。」⁶¹全球化是一個過程，它給人類文明發展的內在機制注入了一種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更新的能力，是人類文明的再生和發展。⁶²

大陸學者時殷弘教授指出：由於民族主義經常蘊含強烈的暴力衝突傾向，其權利要求往往意味著巨大的生命犧牲和後果深遠的國際動態，就更增加了對他們做道德判斷時權衡正義與秩序的必要性。所有民族和國家都應避免道德上的偏激，道德判斷的適度是政策的一個先決條件。追求民族主義的尊嚴必須與其所對各方人民所造成的苦難和其所導致的國際動盪做一權衡。⁶³時殷弘教授的這番論析，在今日面對全球化浪潮的中國大陸，可說是頗具反思能力又深刻的見地。

伍、結論

南斯拉夫學者斯托揚諾維奇 (Svetozar Stojanovic) 曾說「權威的真理代替了真理的權威」(The truth of authority replaces the authority of truth)。這正是對共產黨控制意識形態的結果的最概括說明。⁶⁴具體地說，是「文化專制主義」盛行，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往往成為馬列主義的最終和最權威的解釋者。中共採取各種手段控制意識形態，推行「文化專制主義」以保證中共的全面的、嚴密的領導。干預學術討論和學術發展，製造種種禁區和障礙，使學術、文藝界不斷陷於蕭條狀態，黨對思想意識的壟斷，排除異己，批判打擊，甚至監禁迫害。

思想的僵化和教條化對改革產生了真正的障礙，特別是對科學技術、經濟和政治的現代化影響特大，否認知識在現代化生產中創造價值的巨大作用，而忽視知識份子和教育，在中國成為現代化的重大障礙。

黨對意識形態的控制，特別是對大眾傳媒的控制，製造輿論，謊報事實，使

⁶⁰ 譚君久、〈關於全球化的思考與討論〉、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 132。

⁶¹ 李慎之、〈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及其價值認同〉、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 15。

⁶² 何萍、〈全球化與中國的改革開放〉、俞可平、黃衛平編、前引書、頁 121。

⁶³ 時殷弘、〈民族主義與國家增升級倫理道德思考〉、資中筠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39。

⁶⁴ 蘇紹智、〈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再認識〉、風雲論壇出版社，84 年 8 月，頁 114。

輿論失去監督作用，淪為統治者的辯護士。大道消息失去人民的信任，於是小道消息盛行，而且往往成為事實，致使黨和國家的輿論越來越失去群眾的信任。外國電台往往成為群眾消息的來源，社會日益不穩。

中共現行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意識形態的控制。黨和國家所宣傳的意識形態往往是錯誤的、失實的、不利於生產的，而且與現代化相抵觸，因而意識形態本身也陷於危機。

控制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愚民政策，是民主化的重大障礙。民主化的先決條件是打破黨對意識形態，特別是信息的壟斷，並揭露宣傳的欺騙性。電視、傳真機、廣播電台、衛星轉播在一九八九年中國和東歐的民主運動中已經起過重大的作用。在今天，中共企圖以控制意識形態來維持其統治時，向中國人民提供真實的信息，必將加速其控制的崩潰，並且進一步激化大陸內部的質變。